发展哲学视域下自由与秩序的制度建构

张志勇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重庆 400041)

[摘要] 自由是人的自主活动不受限制的一种状态,是人主体地位和价值尊严的一种确证。自由的本性追求与秩序的内在功能决定了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自由与秩序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作为社会基本价值的个人自由何以可能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根源于国民的自主性与独立人格尚未确立,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的发展,自由问题会日益凸现出来。因此,在当代中国,在一定秩序范围内亟须开展一次新的个性解放运动,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制度创新与建构是这一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法。

[关键词] 自由价值观;自由与秩序;现实的人;制度建构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1)04-0075-05

自由与秩序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人的本性是自由,而制度的本性是秩序。从人的内在本性上讲,人希望自由地、无拘无束地生活。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本性,这样不免引起冲突,秩序就成为必要。另一方面,人又受到秩序的约束限制,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由制度事先设定的,人的行为受到限制,因而人是不自由的。制度使自由与秩序保持一定的张力,既保障人的自由度,又能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

一、自由价值观的逻辑考证

追求自由、向往自由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早期的人们把自由看作如同原始社会般无任何约束的自然的生活状态。柏拉图把有无自由看作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依据,他认为人分为公民与奴隶,公民是自由的,不依附他人,也不受制于他人的强制与奴役,而奴隶则依附于他人,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因而奴隶不是人。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为人所独有,而奴隶没有理性,所以奴隶既不是人,也没有自由。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人是上帝的奴婢,哲学是神学的奴婢,理性是信仰的奴婢,因此所谓的自由只能是意志的自由,但以皈依上帝为前提。人文主义者开始解放理性与哲学,但也是把自由理解为意志的自由,“自由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志的自由;……意志的自

由就是关于意志的自由判断”^[1]。人文主义者把自由看作人的本质,从而批判基督教对人性的束缚与扼杀。

近代哲学以人的解放为中心,以反思的精神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原则。自由在这个时代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

第一,自由是人自我保存的本性,是人生存的权利。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从人的本性出发讨论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制度,提出了社会契约论思想,为资本主义制度做了理论论证。霍布斯认为,人首先是一种“自然物体”,因而人的思想和行动以及人的社会生活受“自然本性”支配,人的“自然本性”就是人的“自然权利”,由于每个人都要去实现自己占有一切的自然权利,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人与人的争斗。解决的办法只有通过契约,把大家的权利交给一个人或由一些人组成的议会,把大家的意志变成一个意志,建立公共权力机关即国家来确保每个人权利的实现和自由的发展。洛克也赞同人的自由本性,只是他反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的看法,他认为自然状态是和平、自由、平等的美好状态,人民只是交出部分权利,国家元首也是订约一方,当他不能维护人民的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时,人民有权推翻他。

第二,自由是人参与社会政治与社会管理的权

[收稿日期] 2011-01-05

[作者简介] 张志勇(1978-),男,河南许昌人,重庆市委党校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哲学的研究。

利。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但在专制政体下人无任何自由可言,共和制的国家实质上也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自由只有靠法律来保证。“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2]伏尔泰认为作为天赋的权利的自由就是“试着去做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利”^[3]。自由首先意味着反对专制暴政和教会的专横,表现为人身和财产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而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有革命的权利,从而用强力夺回和维护自己的自由。“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4]

第三,自由在于对必然性的认识。这个思想可以追溯到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伊壁鸠鲁从他的偏斜学说中引出了自由的概念,认为原子不仅做直线下落运动,也可以有“离开正路”的偏斜运动,这两种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万物。因此,事物的发展不仅在于必然性,也存在很大的偶然性。伊壁鸠鲁在肯定必然性的同时,强调了人的自由,这就从理论上为论证公民个体自由意志提供了依据。霍布斯从因果之间的联系出发,批判了唯心主义者的“意志自由论”,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超脱因果必然性制约的所谓“自由的”意志,人的意志做出的任何选择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人们权衡利害得失的结果。这样一来,霍布斯就否定了人的自由自主的独立意识,把人的一切活动看作是机械运动,人不过是自然必然性的附属物而已。莱布尼茨认为自由不是意志的选择能力,而是从潜能向现实的自我发展。他认为“自由就是自发性加理智”,一个自由人应该认识到他为什么要做他所做的事,自由是被理性所决定的,是必然的行为选择。

西方哲学发展到德国哲学时代,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主要是理性、自由与形而上的问题。康德试图用“二律背反”解决自由与理性的矛盾,他认为人一方面是一种自然存在,服从于普遍必然性的自然法则,在这个领域他是不自由的;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理性存在,能够摆脱自然必然性的制约,意志是自由的,这显示了人的独立、尊严和伟大。人生活于自然世界和理性世界之中,受到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的

双重制约与支配。自然法则支配的是人的自然性一面,理性法则影响的则是人的自由与理性,对人表现为命令他“应该做什么”的道德法则。既然人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物,那么就决定了人的认识只能达到“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在现象世界中,一切都是必然的,无自由可言;而在“自在之物”世界中,应当假定人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这样,康德就完成了他的哲学革命。黑格尔继续康德开创的哲学道路,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他一方面反对唯心主义者的绝对意志自由论,坚持自由必须以必然性为基础,一个盲目地受自然必然性支配的人是不自由的,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把握。“无疑地,必然作为必然还不是自由;但是自由以必然为前提,包含必然性在自身内,作为被扬弃了的东西。”^{[5]272}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机械唯物主义者把人等同于机器,完全受因果必然性的决定。在他看来,在必然行为被认识之前,人的意志受必然性的盲目支配,确实没有自由。“必然性只有在它尚未被理解时才是盲目的”^{[5]259}。但是,人们一旦认识了必然性,必然性就转化为自由了。恩格斯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6]455}但黑格尔所讲的自由只是一种认识论范畴的自由,只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上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不仅体现在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中人的自主状态。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观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前人关于自由的一般思想,但反对脱离生活和现实去抽象地谈论自由。马克思认为研究自由必须从现实中的人出发,现实中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历史人,从事的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感性活动,他既要使自己的实践活动打上人的主观烙印,同时又不得不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和一定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制约,这就预设了人的自由只能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就凸显出了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现实中的人是以三种形式存在的:

第一,作为个体的自由。作为个体的人所固有的精神属性必然有动机、愿望、意志、目的等,并以此去引导自己的活动。个体的人总是倾向于表达自己的追求和维护自己个人的利益,这种个体自由就是个体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活动以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其实质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主体自由首先表现在人作为主体能够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通过有目的有

意识的实践活动,掌握和利用客观规律达到预期目的,这就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状况。“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6]455}主体自由的实现要受到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这就决定了主体自由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渐进的实现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第二,作为群体的自由。人不仅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物,还是一种群体性的存在物。人总是处于一定的阶级、组织或者群体中,社会是个体的集合体,个体的活动首先要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他的自由是以不影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的,离开了这种相互之间的制约,个体便很难生存。维护保持这种个体之间的制约是社会制度的重要价值目标。人以群体存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是社会自由,社会自由就是社会中的人作为群体所体现的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自主状态,人与人的关系不像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那样是一种主客关系,而是一种有着平等地位、分享平等权利的对等关系,人们在这些关系中的权利与地位实际上就是人的各方面利益的体现。社会的基本结构决定和体现着人的自由度,其构成的每一要素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制度来维持运行的,社会制度既要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维持该领域自由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又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体的需要。经济自由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在财产、经营、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自由,这种自由是通过社会制度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保障来实现的。政治自由就是主体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能够通过一定社会政治制度自主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参与社会事务与社会管理的自由,主要体现为选举、投票、决策、监督、集会等自由权利。思想文化自由主要指的是社会主体通过一定的文化制度所享有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主状态,包括新闻出版、言论、创作、科学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自由权利。

第三,作为类存在物的自由。作为类存在物的人以自身实践证明了自己何以为人的内在依据,证明了人的自由不同于动物自由的地方。动物所谓的自由是一种本能的活动,是消极适应自然以维持生命体存在,而人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7]作为类

存在物,人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必然会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社会看作是前进的、发展的,就在于人的这种意识本性,而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注定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也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保证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

自由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动态的历史过程。主体自由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其中经济是基础。要想实现一定的社会自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主体的社会自由提供坚实的基础。政治是保证,民主与法制是实现社会自由的两大基石。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自由,同样离开了法制的自由是假自由。社会自由的实现也离不开一定的文化条件,一个社会的国民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化修养,才能实施自己的自由权利。社会自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一种自主状态,它体现着人们之间的利益划分。社会自由既然是一种自主活动状态,那么个人自由就是每个人都想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都想置身于没有他人干涉的自由环境中。然而,在现实社会这样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当个体作为他人的环境时,他必须遵守不干涉他人自由的承诺,每个人得到最大自由的条件是每个人不干涉他人的自由。这就说明,人们能享有的社会自由最终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制在于他本身的社会关系中来自其他人的存在和利益,这一限制也是社会自由的原则界限:社会自由必须以不妨碍他人应有的自由为界限。

总之,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讨论自由,主张从现实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与活动出发讨论自由。当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从事认识或实践活动时,由于受到外界客观条件制约而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种认识或实践活动对个体来说是不自由、不自主的;相反,当个体在自己主观意志指引下从事一定认识或实践活动,个体成功实现了自己预期的目标,尽管外在客观条件也在起作用,但不存在盲目的强制和被动服从,这种自主状态就是自由的活动,自主活动是人的自由本质。可见,自由是相对于一定条件和范围而言的,世界上从不存在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在一定范围内个体不受外界力量的强制而按照自己意志活动的自主状态,就是人的自由。自由要求主体实现自主状态,秩序要求社会处于一定规则和程序之中,自由与秩序的矛盾冲突是社会所面对的基本矛盾,它植根于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之中。那么,如何保持自由与秩序的合理张力呢?在此问题上,制度具有优先和决定性的作用。

三、自由与秩序矛盾的制度建构

自由与秩序存在着一定张力,作为社会基本价值的个人自由何以可能因此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学者归纳为四种解答思路:“其一,道德与文化的思路……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培养人们的道德利他精神,使人们超拔于区区自利和动物性的求利本能之上。这被看作是解决自由冲突的根本出路。其二,宗教解答思路。……一批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宗教,要求反思启蒙主义的理性宗教观,重新认识宗教在建构人心秩序、保障个人自由中的意义和价值。其三,市场解答思路。……经济自由不仅被当作一切自由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而且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基本动力。其四,制度解答的思路。”而这四种方式中,制度解决又具有优先性,因为“制度的解答在现代社会中是最为有效也最为基本的解答方式,它是宗教、道德、竞争等其他解答方式发挥作用的基本框架和前提条件。”^[8]制度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因此,自由与秩序的张力关系可以体现为自由与制度的关系。

从张力的强度上看,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由占有绝对优势。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社会制度变革与转型时期,社会秩序失范,社会动荡不安,制度处于“失灵”或者“缺位”的状态。新旧制度的斗争使得社会中的人得以自由发表言论,提出多种思想,形成一种思想交锋的局面。第二类是秩序在张力强度上对于自由占有绝对优势,这时的秩序是一种“烟雾秩序”,自由受到极大的约束与限制,人们处于极度的不自由状态中,这主要是由于制度的力量过于强大,以至于超出或凌驾于正常的秩序之上。这段时期,通常是社会徘徊、倒退时期,因为自由度的缺失使得社会失去了活力,社会发展进步也会失去动力。当然,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独裁、专制时期。第三类是自由与秩序保持在合理的张力之内,这是最理想的制度模型,制度站在天平的中间,既不像第一种情况那样向自由倾斜,也不像第二种情况那样向秩序倾斜,而是将自由与秩序保持在一定的界限之内,既不会因为过分强调自由而丧失社会秩序,也不会为了社会秩序而使得社会失去活力。那么,这个界限如何界定,制度在充当二者的调节器中,如何使自身不受二者影响而保持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之上?这是问题的难点所在,也是解决自由何以可能的关键。因为,从制度本身来看,制度就是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规则去限制与约束人们的行为,把自由限制在社会可接受的秩序范

围之内,从而防止自由过于极端化和放纵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自由本身来看,自由就是突破他人或者社会制度限制的一种状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主状态,这也是自由的本性追求。自由与制度的这种矛盾不仅是人不断追求自由、不断变革制度的动力,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事实上,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制度与自由才能一步步向着自己本性发展而不断趋近。人们自由的实现,离不开制度的保障作用,制度通过规定、命令、禁止一种形式的自由而去维护、提倡和引导另一种形式的自由。自由的实现是以遵守制度为前提的,因为制度保证了每个人的自由,而不是某一个人的自由,公正的制度体现为保障大多数人的自由。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所有的自由都是一定条件下的自由,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的实现是一个动态、复杂、长期的过程。

可以看出,自由不是要抛弃秩序、在制度外活动,而是说制度的存在并不影响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自主状态,制度、规则、秩序的存在,恰恰是为了帮助人实现自己的主观愿望,实现人的自由。罗尔斯认为人的自由是由社会制度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决定的,“一个人是否自由,是由社会主要制度确立的权力和义务决定的。”^[9]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一部分人的自由侵犯另一部分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以不影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法律越完备,人们会感到越自由,这是因为法律保证了每一个人自由的同时,又限制了每一个人不正当的自由,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一定制度规则下的人的自主活动状态。为了自由,不是取消法律、制度、规则,相反,应该完善制度与规则,制度越完善,人就越自由,看似悖论,实际上是对立统一。

制度建构是一个改变旧制度和创立新制度的过程,是社会关系大变革、社会结构大调整的过程。在新旧制度转换过程中,旧制度还没有完全失去作用,新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会出现两种制度交叉混合所带来的混乱,也可能形成“制度真空”地带。因此,制度建构要统筹兼顾,一方面要顺应人的自由本性,维护体现人的自由原则;另一方面又要体现秩序原则,保持社会稳定,从而实现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

制度对自由与秩序的协调作用,当前主要体现在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是社会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制度建构过程所必须处理好的关系。改革与革命一样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改革是变革生产关

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必须找到社会发展的动力,其中改革与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两种基本力量,也是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基本方式。革命的方式有其适用的条件与范围,在和平建设时期,改革是推动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的普遍方式,改革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但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而是面临风险,若处理不好就会陷入社会混乱。发展是世界各国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主要任务,要想实现发展就必须改革,不仅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还要对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人们的思想观念、消费方式进行改革,以求得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变迁。发展是有一定条件的,首要的条件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改革与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社会越贫穷落后越容易产生动荡,社会越动荡,社会发展就会越滞后,相反,稳定的社会环境与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制度建构秩序所必需的,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与社会进步。因此,必须重视制度对自由与秩序的协调作用,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度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体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这种转型是在压缩了时空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社会

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异常凸显。要解决转型期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转变发展思路,不断进行制度变革与创新,同时必须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制度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把制度的价值功能更好地体现和落实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

[参考文献]

- [1] 冒从虎,等. 欧洲哲学通史:上卷[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276-277.
- [2]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M]. 张雁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83.
- [3] 北京大学哲学系.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95.
- [4]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
- [5] 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6] 恩格斯. 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3.
- [8] 皱吉忠. 自由与秩序:制度价值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67-172.
- [9]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4.

[责任编辑:夏畅兰]

Construction of Freedom and Order System in the Horizon of Development Philosophy

ZHANG Zhiy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 P. C.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Chongqing 400041, China)

Abstract: Freedom is not only a state of unrestricted human autonomy, but also a confirmation about the human dignity and value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The nature of the pursuit of freedom inherent and the inherent function of order are the unity of opposites, but there is a certain tension between them; how can individual freedom be an important issue as a basic social valu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s faced with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 in China and national autonomy and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have not been established. The problem of human freedom will increasingly stand out, as society modernized, market-oriented and democracy developed. Therefore, we should carry out a new pers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freedom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best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the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liberal values; freedom and order; people in real life; system construction